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历可可西里10年——志愿者讲述.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5
ISBN 7-108-02254-0

I. 亲… II. ①志…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13189号

亲历可可西里10年

——志愿者讲述

杨欣 摄影

邓康延 杨 礁 文字整理

责任编辑 张志军

装帧设计 宁成春

电脑制作 1802 工作室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5月北京第1版

200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14印张

字 数 280千字

印 数 00,001—30,000册

书 号 ISBN 7-108-02254-0

定 价 28.00元



Ke Ke Xi Li

2

亲历
可可西里
10年志愿者讲述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几年前曾去过杨欣他们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写过一篇文章《可可西里一把火》，至今，这把火也没有在我心里熄灭。

梁从诫 “自然之友” 会长

10 年里 20 多人的荒原片断，装订成书，可可西里凸现了命运。……
具有生命痛感的文字。这是荒原上的第一人称，第一人称的荒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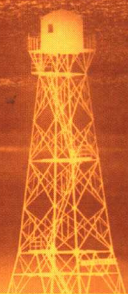
邓康延 《凤凰周刊》总编

这本书让我再次回到了和可可西里相伴的那些个日日夜夜，想起了可可西里令人窒息的暴风雪后，那美丽得令人窒息的满天星光。感谢杨欣和他的伙伴们，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足迹记录下了可可西里保护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陆 川 电影《可可西里》导演

这本书除了让更多人了解可可西里发生的事情之外，或许还能驱除一些人性中的贪婪与邪恶，唤醒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一 直 《藏地牛皮书》作者





亲历可可西里10年——志愿者讲述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拥有这本书，
为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保护
献上一份爱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目 录

序 曾经荒原 008

前言 亲历可可西里 10 年 010

徒手建造“家”——中国第一座民间保护站

无人区的红房子 024

我们手中的中国第一 040

可可西里的发轫之作 050

无人区里的守望者——我们的生活

可可西里的大学生 0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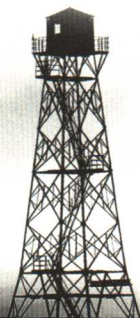
我们夫妻俩 066

我的志愿者生活 074

献出生命中的一个月 082

生命中永远的 9 月 090

一个人的冬天 098



荒原上生与死的较量——我们的工作

反偷猎在无人区——可可西里 12 天 108

执法在可可西里 124

可可西里的狼 130

失去战友的日子 138

守望藏羚羊 146

藏羚羊的红绿灯 156

骨头上的烙印

一个小女孩的微笑 168

青藏铁路从我门前过 174

梦想的天堂 182

走进牧区人家 190

最纯粹的地方 200

青藏公路上惊人的“风景” 208

后记 一本书和一个站 217

附录“绿色江河”志愿者名单 220

关键词备要 222

序 曾经荒原

■《凤凰周刊》总编辑 邓康延
■2005年1月9日夜，深圳梅林一村

这是一片不大适合生命存活的土地，却有两类具代表性的生命韧性地坚守：一类要本能地活下去，另一类要捍卫前一类活下去的权利。于是，藏羚羊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区的人们，在可可西里相逢。可可西里，他是雄性的，高远冷峻，像裸露臂膀的高原汉子；她又是母爱的，博大不言，默默哺育怀抱里的一切生灵。但在荒原的静夜里，有心人能听到她深深的叹息。生命本是奇迹，却在这片土地上的20和21世纪交接处，屡遇悲剧。为抗严寒，藏羚羊或许以百万年的进化单位长出了一身无与伦比的皮毛，这是生存的宝，却也是死亡的衣。盗猎者的枪口下，纵是百万年的自然结晶和生存法则，刹时也被洞穿，弹孔里渗出血色黄昏。奔着繁华而去的人，留下更多的苍凉。高原上种种生命的归宿，地球村人类的归宿，人类心灵的归宿，三者之间或许存有一种函数关系。尊重他人，便是端庄自己。遗憾的是很多人不懂这个等式。如果我们自己变作一只藏羚羊，会如何看待身边发生的事儿呢——在原本熟悉的土地和节令里被突然的流弹击中；或是被渐渐扩张的柏油路、铁轨以及轰响的

巨物所困扰；春天和春天的约会被延迟或取消，生命密码被打乱，断断续续不知能传递到哪一代。对人类而言，原生态只是一种静态；对野生动物而言，那是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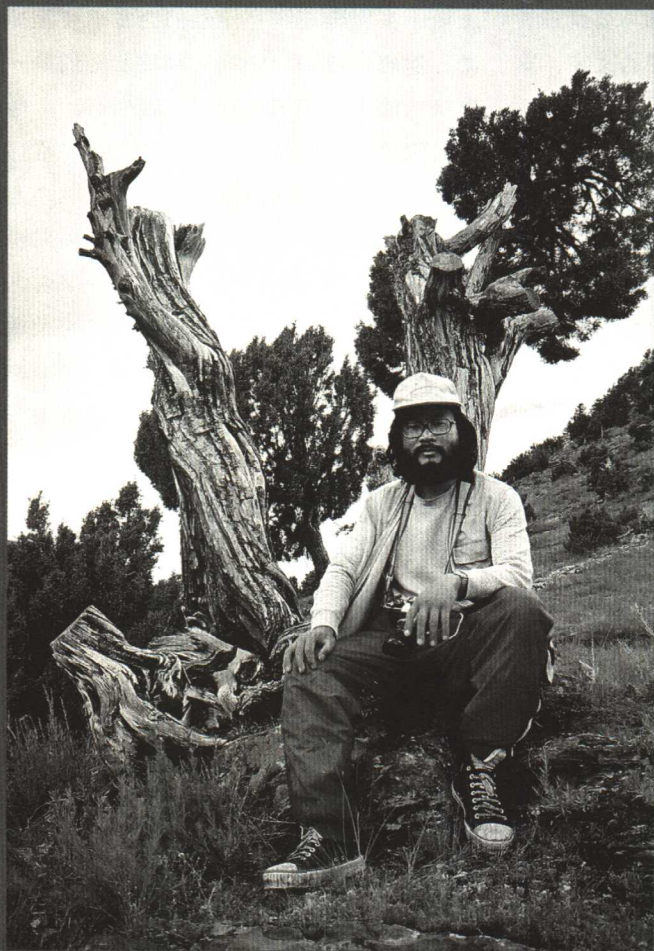
人，只是一辈过客，偶来一趟，借宿地球，一些人去了，另一些人又来，驿站依然，继续为后来者标注远方。人没有独裁大地所有版面的权力，也没有惟我独尊的权利。其实，很多时候，与地斗，其苦无尽。我曾于1998年6月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区住过一个晚上。寒夜、高天、旷野、缺氧使我头痛欲裂。两位守站的藏族兄弟受杨欣嘱托，一直呵护着我。风像劫舍的汉子剧烈拍打着简易的门窗、四壁和架空的地板，我的心思飘忽而善感。那些藏羚羊和其他动植物该是怎样在风雨中摇曳。它们简单得像草，大风来了全部伏下；大风去了，又挺起腰身。那是荒原上自生自灭自强的生灵，不图亘古，只取眼下；不求宏远，但守细微。风过来了，云过来了，聚敛之处，遂成风云。已有不少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片、纪录片、文章和摄影，但以切肤的生存体验和团队的力量集中去表达此一主题，这或许是第一次。这是可可西里的视

角、藏羚羊的视角、个性感知与公共理性汇合的视角，是具有生命痛感的文字。这是荒原上的第一人称，第一人称的荒原。如果我们所信奉的东西与所做的事情呈两样，则无快乐可言。当今社会已有太多的虚假，真情像野生动物般珍稀。此时的环保主义者匍匐在零落的阵地上坚守。或许得之于知识的提醒，苦难的记忆，同道的共鸣，心灵的指引，他们的旗帜五颜六色，却隐约透现出相同的旗语，那是四个大字：悲天悯人。他们在感念苍生中感念自己，在助人中发现自己受助。天演平衡，所欲随心。他们是志愿者、义工、环保主义者、NGO成员。他们乐于为急需血的人挽起袖子；他们不用一次性筷子和纸杯；他们带着铺盖卷去穷乡僻壤教贫困孩子；他们为大坝、高尔夫球场、豪华别墅鲸吞的河流、

土地、乡村奔走呼号；他们会在暗夜里感动、愤怒、流泪、失眠。本质上他们是一群快乐的人，健康、开朗，崇尚行动。他们又确是杜甫的后人，“生年不足百，常怀千岁忧”。当一个人要把万千条被大潮冲上岸的垂死小鱼拼命扔回海里，对大局来说这很可笑，对一条死里逃生的小鱼来说这很壮美。谁能否认，敦刻尔克海岸的大撤退不是诺曼底的大反攻？天下深道理，原本浅白在海滩。我和这本书的诸多编写者是朋友，曾在雪原上分寒，思念中共暖。我感佩他们。野性贯穿血脉，他们感知了文明；痛楚嵌入记忆，他们真切地热爱生活；遭遇过许多非正常死亡，他们尤为敬畏生命。10年里二十多人的荒原片断，装订成书，可可西里凸现了命运。可可西里，大地犷美的章节，令人不忍卒读。

布喀达坂峰海拔4900米处分布着温泉，水温超过90摄氏度，高于当地开水的温度。





杨 欣：

现任“绿色江河”会长。从1986年漂流长江后开始关注长江源，此后18年中，二十余次进入长江源和可可西里地区，通过图书义卖筹集资金，带领“绿色江河”志愿者在可可西里建立了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保护站——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启动了中国民间长江源及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通

过10年的努力，使长江源的生态环境状况和藏羚羊的命运得到社会公众和各级政府的关注，同时自身也完成了从摄影师到探险家又到环保人士的转变。■1994年到2004年的10年间，亲历了野牦牛队的崛起和解散、扎巴多杰的突现和去世、江泽民题词“长江源”环保纪念碑的策划和建立、可可西里保护区的建设和发展、青藏铁路的开工建设及对生态的影响和保护、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创建和志愿者活动的开展、志愿者冯勇的牺牲等等，是可可西里10年来重要的见证者之一。

一个中国西部的民间环保组织在没有任何专项资金的情况下，完全依靠书籍义卖和极为有限的零星捐助，克服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在极端恶劣的气候环境中建立起中国民间第一座自然保护站，又完全依靠志愿者的力量，在可可西里孤军奋战了10年。面对长江，面对可可西里，面对索南达杰在天之灵，我们尽力了，我们问心无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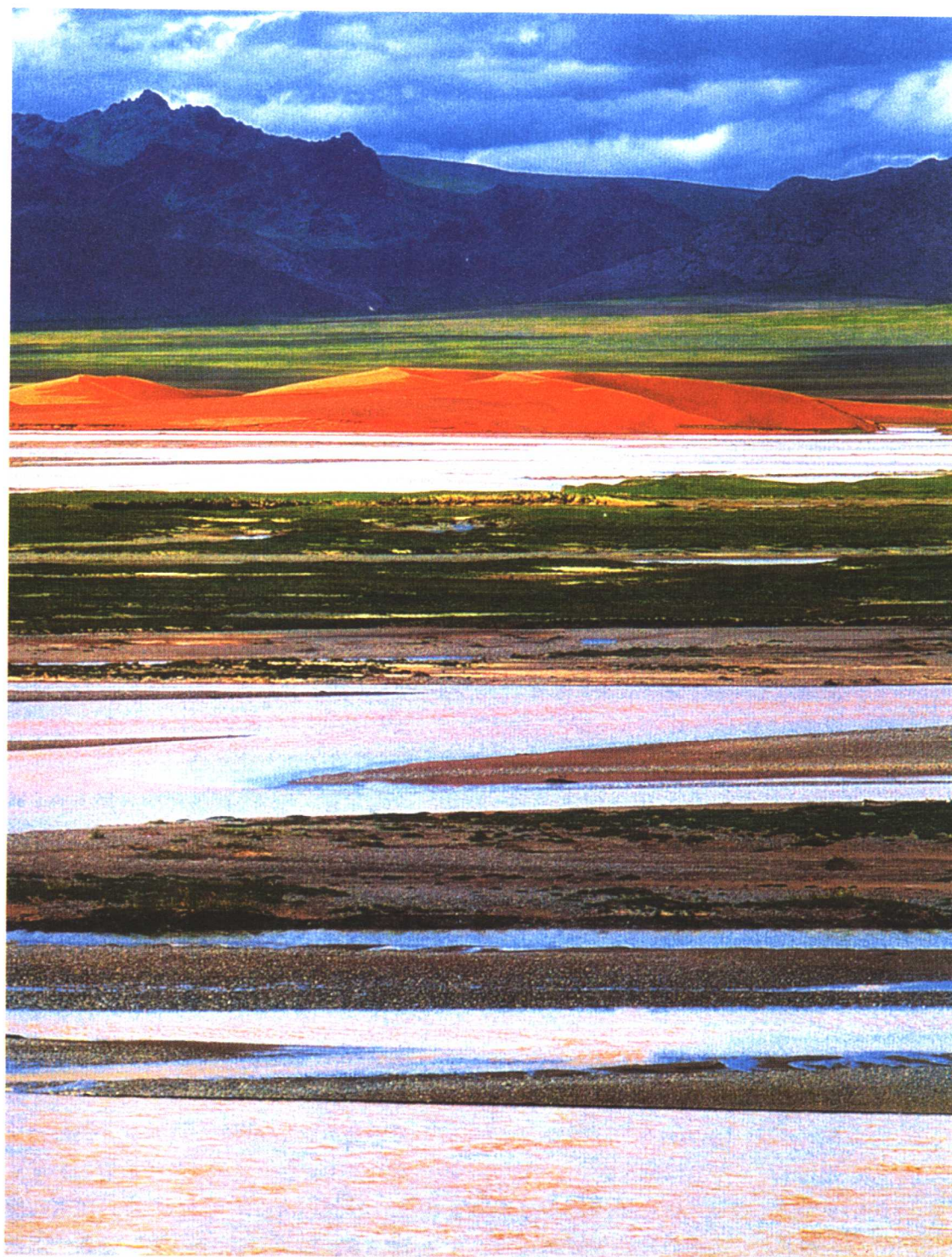
前言 亲历可可西里10年

“可可西里”是蒙语，意思是“美丽的少女”。可可西里没有严格的界定，有资料说是12万平方公里，也有说是8万平方公里，与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连为一片，为中国最大的无人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大型兽类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长江北源楚玛尔河发源于可可西里腹地的可可西里山。20世纪80年代开始，可可西里以非法采金而闻名，最疯狂的时候曾有数万人在那里狂采滥挖。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藏羚羊绒制品进入国际黑市，受巨额商业利益的驱使，大批非法偷猎者进入可可西里，开始大规模非法猎杀藏羚羊。

我听到的可可西里

1993年7月，在我第四次长江源探险考察中，一位叫金巴的藏族向导指着长江源的北面说：“那里就是可可西里，是真正的无人区，一个牧民都没有，去那里的人除了淘金的就是打猎的，不是土匪就是强盗，机枪和火箭筒他们都有，你们敢去吗？”在场的几位资深探险家被金巴的话刺激得热

血沸腾，连续几天的讨论话题都围绕着可可西里，似乎可可西里已经成为他们下一个探险的目标。在金巴这些牧民的眼里，可可西里不仅是无人区，更是一个弥漫着火药与血腥的非法区，当地几乎没有牧民进入过可可西里的深处。1994年8月，我第五次探险考察长江源，在沱沱河水文站休整期间，我从青海的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整版的文章，标题为《高原魂》，内容是介绍一个县领导的事迹，我以为又是高大全的文章，并没有细看。那次长江源考察结束的地点是青海曲麻莱县，当地传颂着一个英雄的故事，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杰桑·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在可可西里与偷猎者展开激烈的枪战，最后中弹牺牲。我想起那张在水文站看到的报纸，又从当地找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正是索南达杰的事迹。治多县距离曲麻莱只有几十公里，我没有犹豫，驱车赶到治多县。虽然索南达杰已经牺牲了大半年，但设在他家的灵堂还在，灵堂的正中放着他的骨灰盒、遗像，四周是当地人敬献的哈达和挽联，最多的是长明的酥油灯。索南达杰是用酥油火葬的，这在当地是最高规格。



通天河畔的沙丘

索南达杰生前的秘书扎多接待了我。向我讲述了索南达杰的许多故事和动物保护的设想,我被他的人格魅力所震撼。临走,扎多补充了一句:“索南达杰生前梦寐以求的是希望在可可西里边缘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作为反偷猎的前沿基地。”我没有做声,在索南达杰的骨灰前默默放上了一盒月饼:中秋节快到了,兄长你走好了,我一定还会回来的。第二年,索南达杰被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联合命名为“环保卫士”。索南达杰是中国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可可西里保护区

离开治多县后,我来到深圳,连续几个月的日子里,索南达杰牺牲时被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所凝固的跪卧持枪推子弹准备射击的雕塑般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我寄宿在朋友家中,坐在一张只有三条腿的椅子上,开始起草“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的宏大计划。三个月中,我四处咨询,查阅资料,终于在1995年2月完成“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的5年计划:5年中要组织科学家、新闻工作者、志愿者,对长江源及可可西里地区进行4次生态环境综合考察,并分别建立4个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与当地政府合作,对该地区的野生动物进行强制保护;与国内外科研院所的专家合作,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系列的考察和研究,制定更加全面的保护方案,促使政府建立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的保护;同时招募志愿者在当地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培训,并通过志愿者对当地的环境状况进行更广泛的宣传,呼吁社会公众对长江源、可可西里生态环境加以关注和支持。

1995年4月,在深圳世纪文化公司郑建平先生的支持下,我与志愿者王毅飞往西宁,游说青海政府有关部门对这个项目加以认可和支持。每到一处我都首先声明,不要青海政府的一分钱,只要你们出红头文件支持这个项目,我们到东部地区筹集资金。最多的一天我跑了六个部门,同样的话讲了六遍。有关部门都口头上表示支持,至于红头文件都存有疑虑。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对社会有影响的民间环保组织,也没有民间组织的环境考察活动,更谈不上建立民间的保护站了。政府都做不了的事,民间更指望不上。不得已,我直接敲开青海省委书记尹克升先生的门,秘书高钰先生接待了我,并很快安排我和尹克升书记见面。尹书记就长江源、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和我探讨了近一个小时,并对我们的计划给予认同,他最后对我说:“按照你的计划该找哪个部门就找哪个部门,我给省政府办公厅打电话。”此后,我得到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史国枢副秘书长、环保局王永玲局长、农林厅陆文正副厅长的支持,最后环保局和农林厅共同下文,支持这个项目。在陆文正副厅长的办公室,他专门向我介绍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规划。青海政府一直争取在可可西里建立自然保护区,但又苦于没有资金。保护区建设有规定,省级自然保护区由省政府出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中央政府出钱。青海没有钱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就直接向林业部申请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希望中央政府能出钱。但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有规定,要首先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之后,才能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于资金的制约,可可西里保护区的建设就遥遥无期地搁在

那里。1995年7月，在拿到青海允许我们开展长江源环境保护的红头文件后，我来到北京，寻求国家环保局对这个项目的认可和支持。那时，北京人对于可可西里、藏羚羊、索南达杰都还相当陌生，在朋友和热心人的帮助下，我频繁召集和出席各种聚会，反复宣传可可西里、藏羚羊、索南达杰以及我们的宏伟计划，最终取得部分科学家和新闻记者的支持，国家环保局王玉庆副局长对我们的项目也进行了批示，支持这项活动，我拿到国家环保局的红头文件，但文件中写明所有资金要自己筹集。

在北京的日子里，我认识了许多关注环保的有志之士，给我很多的关照，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梁从诫先生。那时梁先生领导的“自然之友”环保组织也处于萌芽阶段，但他对我们的项目格外关注和支持，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杨欣，你看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10年来，梁先生的这句话说了多少遍我已经不记得了，但这10年中对于我提出的请求，梁先生都给予了无私的支持和帮助。1995年底，梁从诫先生在香港开会后专程来到深圳，帮助我游说深圳市市长，寻求深圳市政府对长江源保护项目的支持，最后深圳市政府给予了30万元的资助，为长江源及可可西里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的启动奠定了基础。同年年底，《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发表王伟群的文章《血染的希望》，第一次以整版的篇幅介绍了索南达杰、可可西里、藏羚羊和我们正在开展的保护行动，随后《读者》全文转载。可可西里开始引起社会更多人的关注。1996年1月，“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的记者招待会在北京举行，除了各大新闻媒体以外，国家环保局解振华局长、王

玉庆副局长、中科院院士孙鸿烈先生以及青海省、深圳市环保局的领导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对这个项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1996年5月，长江源生态环境综合考察队从深圳出发，在出发仪式上，王玉庆副局长专门从北京赶来和深圳市的领导为考察队送行。考察队到达青海后，青海省有关领导都出面接见、座谈，给这项活动以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我带领这支由科学家、记者、志愿者组成的联合考察队进入了长江源区和可可西里地区，亲眼目睹了这里的自然环境状况和生态的恶化，并通过媒体首次全面报道，呼吁社会对这里的关注。这次考察中我在玉树认识了治多县西部工委的第二任书记奇卡·扎巴多杰。

反偷猎在行动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玉树州西部的治多、扎多、曲麻莱三个县分别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时任治多县委副书记的索南达杰担任了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开始可可西里矿产资源的全面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可可西里非法偷猎藏羚羊的现象非常严重，偷猎已经对野生动物资源造成严重的破坏，索南达杰毅然把工作重心从寻找矿产资源转移到保护野生动物上来。两年中，索南达杰带领3名成员12次进入可可西里，由于势单力薄，在一次反偷猎中，索南达杰英勇牺牲，治多县西部工委也就自然解散了。索南达杰牺牲一年后，时任青海省玉树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委员副主任的扎巴多杰递交了重新组建治多县西部工

委的报告，并辞去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回到治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兼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可可西里有45000平方公里，西部工委只有几个人员的编制，在人员编制不足的情况下，西部工委在县城张贴广告，招募队员，打算重新进入可可西里开展矿产开发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扎巴多杰是索南达杰过去的同事、朋友，同时还是索南达杰的妹夫，他继承了索南达杰的职位和所有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西部工委的工作恢复，并逐渐壮大为一支五六十人的队伍，成员多来自退伍军人和当地的牧民，多是藏族兄弟，岁数从十五六岁到五十多岁，还有牧民赶着牛羊来加入这支队伍。治多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政府机关干部的工资经常难以兑现，对于西部工委的工作爱莫能助。扎巴多杰出发前，政府给他们的一辆北京吉普车加满了油，就算作是支持了，但允许西部工委在可可西里的所有罚没收入归他们自己支配。扎巴多杰带领这支光杆队伍开始承担起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的重任。4500米的高原上就地挖一个坑，在上面铺一块塑料布就成了他们的大本营。所有被褥、锅碗都是队员从自己家里拿来的，甚至有一些枪支都是借来的。西部工委的第一笔钱来自贷款，他们用贷款购买了一辆东风大货车，既可以装东西也可以载人，东风车成为继索南达杰牺牲后在可可西里出现的第一辆反偷猎车。那时的条件只能用十分艰苦来形容，但所有的队员精神饱满，生龙活虎，对前途充满希望。因为西部工委不只是反偷猎，还担负着开发可可西里矿产资源的责任。一些西部工委招募的临时工队员希望，自己在从事反偷猎工作几年后，能转

为国家的正式职工或干部。这也是其中的动力之一。但他们最后离开可可西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成为正式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落下了头痛、关节炎、风湿病、心脏病等一身的病痛。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西部工委在反偷猎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们罚没的汽车等收入补充到反偷猎的经费中，甚至一些罚没的藏羚羊皮也被一些黑市商人收购，归入西部工委的经费。其实西部工委的角色十分尴尬，一方面他们要通过严厉的打击，把偷猎者赶出可可西里，还可西里的宁静；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了偷猎者，西部工委又失去了经济的来源。每次的反偷猎行动，队员们都很有矛盾，不过还是希望能抓到偷猎者，而且是装备精良的偷猎者，这样他们才有饭吃，才能武装自己，才能继续保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这种尴尬一直持续到1998年西部工委获得社会的外援之后，罚没的藏羚羊皮再没有流入黑市，而是被封存或者焚烧。“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计划在长江源及可可西里地区建立4个自然保护站，第一个保护站确定建在可可西里腹地的楚玛尔河流域。1996年长江源环境综合考察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保护站选址。但扎巴多杰给我建议：楚玛尔河自然保护站不要建立在楚玛尔河边，楚玛尔河是风口，冬天不仅风沙大，还特别冷；同时，楚玛尔河是咸水，不能饮用。青藏公路穿过的楚玛尔河流域只有一处常年有流水，就是青藏公路2952公里处的清水河。其实清水河的水也是不能直接饮用的，河水中汞等重金属严重超标，不过我们饮用了5年后才知道真相。清水河发源于昆仑山，把十几个大小湖泊连在了一起，这里有